

文史哲研究丛刊

先秦兵书研究

解文超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文 史 哲 研 究 丛 刊



先秦兵书研究

解文超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先秦兵书研究/解文超著.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7

(文史哲研究丛刊)

ISBN 978-7-5325-4673-2

I. 先... II. 解... III. 兵法—研究—中国—先秦时代
IV. E89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64669 号

文史哲研究丛刊

先秦兵书研究

解文超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网址: www.guji.com.cn

(2)E-mail: guji1@guji.com.cn

(3)易文网网址: www.ewen.cc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经销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19.25 插页 2 字数 277,000

2007 年 7 月第 1 版 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300

ISBN 978—7—5325—4673—2

K·978 定价:49.00 元

如发生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先秦兵书研究与当代价值

赵逵夫

《左传·成公十三年》载刘康公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礼仪制度和战争，构成社会政治演变的主要环节。人类的历史，从时间和空间两方面言之，不是和平时期或稳定的环境，就是战争时期或战乱的环境。而由战争转变为和平，也总是通过了一定的礼仪方式（如和谈、结盟等）。在和平时期或和平的环境中，人们的生活、交际总是根据既定的礼俗习惯、伦理道德或礼仪制度进行的。所以说，礼仪制度、风俗，还有战争，这两者不仅显示了历史在时间进程中的色调和节奏，也构成了历史的主要内容。我们通过对礼仪、习俗的研究展示社会生活史，而通过对战争的研究展示社会在巨变阶段的具体状况及变化规律。

有关历史上一些战争的具体情况，各种史书，包括各种正史和野史都有所记载，而关于战争进行的一般规律和我国古代人们对于战争的认识，有关战争的理论，则主要见于古代的兵书。

我国先秦时代留至今日的史料不多，但比较起来，兵书和描写战争的作品倒不少。《左氏春秋》等以大量篇幅描写战争的作品这里不说，仅兵书而言，存留至今的完整的著作就有《孙子》、《吴子》、《司马法》、《孙臆兵法》、《六韬》、《尉繚子》这六部。此外，《墨子》、《商君书》、《管子》、《荀子》、《鹖冠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书中也有些篇章专论军事^①，或阐述军事思想，或论用兵之道，对我们探讨先秦

① 诸子著作中有关军事的篇章如《墨子》中的《非攻》三篇、《备城门》、《备高临》、《备梯》、《备水》、《备突》、《备穴》、《备蛾傅》、《迎敌祠》、《旗帜》、《号令》、《杂守》；《商君书》中的《战法》、《立本》、《兵守》、《境内》；《管子》中的《七法》、《兵法》、《地图》、《参患》、《制分》、《势》、《九变》及《玄宫》的后半篇；《荀子》的《议兵》、《鹖冠子》的《近迭》、《世兵》、《兵政》、《世贤》、《天权》、《武灵王》；《吕氏春秋》的《荡兵》、《禁塞》、《论威》、《简选》、《决胜》等。《韩非子》的很多篇中有些关于军事兵学的片断，此不毕述。

时代人们在这方面的认识,探讨古代军事理论的丰富内容与思想体系,有很大的作用。

但从今日文献学的角度看,关于先秦兵书,还有很多问题有待作深入的研究。最主要的,一是对其作者多有怀疑(如《吴子》、《六韬》、《尉繚子》、《孙子》、《司马法》等)。二是产生时代多不确定(如《司马法》的产生时代,各家看法就分歧很大^①,《吴子》、《六韬》、《尉繚子》的产生时代也有分歧)。三是长期以来人们对其真伪有所怀疑(如《吴子》、《尉繚子》、《司马法》,不仅产生时代看法有分歧,且清代以来一直有人疑为伪作^②)。虽然由于1972年山东银雀山西汉墓出土了《孙子兵法》、《孙臆兵法》,还有《尉繚子》、《六韬》的残简,1973年河北定县西汉墓又出土了《太公竹简》,对先秦兵书持普遍怀疑态度的状况有所改变,但有些问题并未能很好地解决,因而,有些人仍持保留态度。所以,有必要对前人的各种说法进行归纳、分析,辨其正误,对一些问题进行全面的清理和深入的探索、研究。

当然,在先秦兵书研究上的有些问题,如果按今天文献学的观念去考察,恐怕永远得不出可靠的答案。比如有几部书的作者问题、时代问题。《孙子兵法》、《孙臆兵法》、《吴子》的作者,虽然曾经有人提出过怀疑,但现在普遍认为是清楚的;《尉繚子》的作者也可以肯定是尉繚子,只是尉繚子为何时之人,史料不全,学者们的看法有分歧。至于《司马法》、《六韬》,其作者就很难确定。

何以先秦兵书的时代和作者问题如此复杂?我以为这和兵书的性质、兵书内容的积累和兵书的编撰过程、兵书的实用性、运用场合

① 如有的学者认为“它孕育于黄帝至殷商,草创于西周,发展于春秋,成书于战国之初”(钮国平《司马法笺注》)。而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以为刘歆所伪撰。姚鼐则认为东晋以后人所伪撰,其《读〈司马法〉〈六韬〉》云:“世所传者,泛论用兵之意,其辞庸甚,不足以言《礼经》,亦不足以言权谋也。盖古书亡失,多在汉献、晋惠、愍间,而好伪者东晋以后人也。”而《六韬》一书,自宋代罗泌《路史·论太公》、章如愚《群书考索》、王应麟《汉艺文志考证》以来,疑者更多。

② 姚际恒《古今伪书考》云:《吴子》六篇“其论肤浅,自是伪托”。姚鼐《读〈司马法〉〈六韬〉》云:“今《吴子》仅三篇,《尉繚子》二十四篇,魏晋以后乃以笳笛为军乐,彼吴起安得云‘夜以金鼓笳笛为节’乎?苏明允言‘起功过于孙武,而著书颇草略不逮武’,不悟其书伪也。”关于《司马法》,姚际恒《古今伪书考》云:“今此书仅五篇,为后人伪造无疑。”张心澄《伪书通考》、黄云眉《古今伪书考补证》、顾实《重订古今伪书考》并袭二姚之说。

有关。

大家都知道,先秦兵书在形式上有三个特点:

一是多押韵。如《孙子兵法·始计第一》:“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清姚文田有《孙子古韵》,江有诰有《孙武子韵读》,当代钮国平教授有《孙子释义附韵读》(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司马法笺注附韵读》(甘肃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俱可参,此处不详论。

二是多以数为纪。如《孙子兵法·始计第一》的“五事”:“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军形第四》:“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数,四曰称,五曰胜。”《火攻第十二》:“凡火攻有五,一曰火人,二曰火积,三曰火辎,四曰火库,五曰火队。”以下则一一陈述之。其他如《谋攻第三》:“军之所以患于军者三”,“知胜有五”,《九变第八》的“五危”;《用间》所谓“用间有五”等,皆属此类。《吴子·国图第一》:“凡兵之所起者有五:一曰争名,二曰争利,三曰积恶,四曰内乱,五曰因饥。其名又有五:一曰义兵,二曰强兵,三曰刚兵,四曰暴兵,五曰逆兵。”《料敌第二》谓“凡料敌有不卜,而与之战者八”,“有不战而避之者六”,同此。《治兵第三》的开头即言“先明四轻、二重、一信”。《论将第四》:“故将之所胜者五:一曰理,二曰备,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约。”“凡兵有四机:一曰气机,二曰地机,三曰事机,四曰力机。”不具述。

三是排比句多。在以数为纪列出纲目之后,以下即以排比句依次加以阐述。一般行文中,也多用排比。如:“夫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等等。

这三点是由先秦兵书的性质和它的实用性及应用场合决定的。

兵书是用来指挥打仗的,指挥打仗虽然在后来也有“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的情况,但在早期基本上都是主帅临阵决策的。而且,指挥作战也不像其他事,可以翻一大堆书,从容研究,仔细斟酌。这要在对战争的各方面规律、各种战争的特征、战争各个环节上的变化规

律都了然于心的情况下,根据情况,综合考虑,当机立断。所以,兵书要求便于记诵,且便于凭空在头脑中检索其内容。所以,把一些内容提炼出要点,加以编次,句子凝练整齐,又押韵,如格言谚语,比较上口,即便于记忆,也便于回忆和检索。

可以想见,在军事理论被著之竹帛之前,人们也是将一些指挥作战的经验,以及长期以来所总结、归纳出的战争理论,编成凝练的格言、谚语而流传的。

人类社会,至迟从父系氏族社会开始,便常常为了夺取生活资源、生产资料而发动战争,先是氏族之间、部落之间,后来是部落联盟之间,征战不已。我国史前时代著名的炎黄阪泉之战,黄帝伐蚩尤的涿鹿之战,尧、舜、禹的伐三苗等,今天只存下了简单的记述和神话的梗概,但当时肯定都经历了较长的时间,规模也是比较大的。《史记·五帝本纪》中说阪泉之战,黄帝“教熊、罴、貔、貅、豹、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这是说黄帝统领了以熊、罴、貔、貅、豹、虎为图腾的部族与炎帝族作战。这些不同部族的军队联合作战,总有一个协调、配合的问题,这就牵涉到布阵和策略的问题,也会对地形、天气等因素有所考虑。大战三次,在第一次、第二次之后,总会有一个对方军事力量的分析、重新估计问题,甚至也会想到派人刺探对方虚实和作战计划的问题,这样就产生了料敌、用间的经验与理论。所以说我国古代军事理论的积累,开始很早,应该说从传说的五帝时代就开始了,当时虽然没有留下书面的东西,但一些格言、谚语流传了下来,却是完全可能的。

从这个角度说,我国最早的兵书中是包含有自五帝时代传下来的有关部族战争的经验的。我们不能根据书编成在什么时候,就断定书中的内容产生在什么时候。

《史记·太史公自序》云:“非兵不强,非德不昌,黄帝、汤、武以兴,桀、纣、二世以崩,可不慎欤?《司马法》所从来尚矣,太公、孙、吴、王子能绍而明之。”(按《集解》引徐广曰“王子成甫”)又云:“自古王者而有《司马法》,穰苴能申明之。”说《司马法》作为一部书,其内容从黄帝时即开始孕育,西周时期为草创阶段,恐怕很多人难以接受;但如果说明《司马法》中包含有黄帝以来的一些作战经验和古人对于战争性质的

某些认识,我以为还是可以成立的^①。

我们由上面所说先秦兵书的这三个特点可以想到,在兵书产生之后,后人著述中,也会吸收此前兵书中的一些内容,或照搬,或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理论概括能力加以改动。因此,在先秦兵书中就难免会产生个别内容相近,甚至表述文字也相近的情况。这样,我们就不能因此而确定先出现之一书为伪书,也不能认为后出现的一种为杂凑而成。它们的“同”反映了这些军事理论家在思想上、理论上的继承关系,它们的“异”反映了这些军事理论家根据自己所处时代、环境和面对的问题在实践上、理论上的发展与创新。

所以,我认为每部先秦兵书总会有一个最后编定的时间,或者初具规模、形成最初传本的时间。但要求书中所反映从内容到语言完全同这个时代的情况相合,是不符合实际的。

解文超同志在内蒙古大学攻读先秦两汉文学,取得硕士学位,之后在军事院校讲授中国古代文学和军事文献。2001年到河北大学作访问学者,次年考为我的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先秦两汉文学与文化。我根据她的专业基础和工作的特点,建议她以先秦兵书为研究选题。根据我的设想,不仅要研究兵书文献学方面的问题,还要从文体、结构特征、语言风格、文学性的方面进行观察,也就是说,还要关照每部书在文学方面的意义和影响,所以,当时限定只以六部完整的军事著作作为研讨的对象,其他诸子著作中有关军事的篇章只作为旁证、参照和参考。我开列了一些书目,包括古代的重要注本、有代表性的研究著作和今人的重要著作与有关出土文献资料让她去读。研读中,对其中一些问题我们也多所讨论。经过两年时间,她完成了学位论文《先秦兵书研究》,这便是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著作。两年中解文超同志克服了家庭方面的不少困难。而且在她即将毕业之时,原单位又改制,她面临新的工作单位的选择问题。这些都未能影响她对论文的

^① 当然,《司马法》这部书的整体构思编写成书,时代较迟。伏俊琰《〈司马法〉的作者、性质及篇数》一文认为是太公以来主兵者所论,而编者为齐威王时大夫,是齐威王时诸大夫所追论的军礼。见《河西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

完成。论文答辩中,得到一些专家的好评。我从她的身上看到了学者的作风,也看到了军人的作风。她是很坚强的。

解文超同志的这部书分为三编:

上编为《先秦兵书的文献学研究》,对先秦六部兵书的真伪、产生时代、写定与作者、著录、流传等问题的研究作了全面的回顾、清理,斟酌各家之说,谈了自己的看法,反映了作者在这些问题上整体关照下的思考,有的地方也反映出了作者的钻研与探索。书中广泛利用了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的成果,并把这些兵书与同时代的文献进行比较,寻找线索,追根溯源,又利用地下出土的文献资料和相关研究成果,以解决疑难。

中篇为《先秦兵书思想研究》,对这几部兵书中反映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心理学思想、管理学思想作了深入的探索。

兵书是用于指导战前的布置与准备、战争中的具体指挥和处理相关突发事件的,关乎国家之兴废存亡、个人与民众之生死。所以,兵书中突出地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精神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也特别注意总结规律性的东西,关注事件的变化,因而,体现出明显的唯物主义思想与辩证的思想。所以,从哲学方面说,我国的先秦兵书是一笔宝贵的遗产。

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两者是互相转化的。如何看待战争的作用,如何对待战争,这是十分重要的,不仅关系到国家社稷的存亡,最主要是关系到广大人民的生死及是否能正常生活。是维护和保护了广大人民的正常生活环境,有利于社会的进步与发展,还是破坏了广大人民正常的生活环境,不利于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在这方面,我国先秦兵书提出了十分成熟、深刻的见解,如《孙子·谋攻》云:

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

这种思想基本上贯穿了先秦兵书。《吴子·国图第一》云：

昔之图国家者，必先教百姓以亲万民。

《司马法·仁本第一》：

古者以仁为本，以义治之之谓正。正不获意则权；……是故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

战道：不违时，不历民病，所以爱吾民也；不加丧，不因凶（按，言不趁敌国遭遇饥谨而攻打），所以爱夫其民也；冬夏不兴师，所以兼爱民也（按，指爱敌我双方的民众）。故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亡（忘）战必危。天下既平，天下大愷，春蒐秋狝，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战也。

《六韬·文韬·文师第一》云：

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天有时，地有财，能与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归之。免人之死，解人之难，救人之患，济人之急者，德也；德之所在，天下归之。与人同忧同乐、同好同恶者，义也；义之所在，天下赴之。凡人恶死而乐生，好德而归利，能生利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归之。

人类社会走过了两三千年，到今天，这些思想的光辉不但没有减弱，而且更显得耀眼夺目，显示出其价值。人类要建立和谐的社会，必须有大家都能接受的约定，同时，又要对不顾大多数人、大多数民族、大多数国家的利益而放任一己私欲无限度地膨胀，甚至不考虑整个社会的稳定安全而歇斯底里发作的危险分子有所防范和制裁。我觉得先秦军事著作中的很多思想在今天仍有指导和借鉴意义。

兵书是讲如何对待战争，如何指挥作战的道理的。作战就要分析

对方主帅、士卒的心理,也要掌握自己周围将士的心理。所以,其中也有不少从人的心理方面论述问题的地方。这对于我们了解先秦时代心理学的发展状况及军事心理学的发展水平,都是有意义的。

先秦兵书中一些管理学和策略学理论,近代以来引起东西方学者的关注。日本最先把《孙子兵法》的理论用于商业领域。日本松下电器集团、精密工业株式会社、索尼电器集团和汽车制造业的本田、日产、丰田等公司都用《孙子兵法》培训管理人员。哈佛大学商业管理学院给学生讲授《孙子兵法》课程。实际上《吴子》、《孙臆兵法》等其他几部先秦兵书中,也有不少讲战略和管理的理论。所以,在这方面进行研究,是对先秦兵书现代意义上的开掘,是对先秦兵书的理论根据当前的需要做新的阐释。

先秦兵书确实是我们的宝贵的思想资源。解文超同志在这方面所作的探索,是很有意义的。

本书的下编是先秦兵书的文体与文学性研究。兵书本来是一种学术著作,但很多内容是在长时间中提炼而成的,简洁明快,又含意深刻,多警策之语,颇类格言,所以往往发人深思,给人以启迪,叫人感到余味无穷。又因其多用韵语,句式整齐,且多采用顶真、排比、对偶、比喻等修辞手法,所以也是好的散文作品。后代的一些散文选本也常常选到。有的学者认为欧阳修的《醉翁亭记》等散文句子较短,又好以“也”字煞尾,是学了《孙子兵法》的语言风格,不是没有道理。本书在这方面作了些有益的探索。对先秦兵书的文体和文学特征作全面探索,应该说本书是第一部。

从全书这三编的安排可以看出,本书是对先秦六部完整兵书的全面研究,从研究范围上已显示出开拓的意义,显示出作者在今天新的社会环境之中,对这些兵书的价值的新思考。

解文超同志的这部《先秦兵书研究》在先秦六部兵学专著的研究方面,既总结继承了前人的成果,也对前人所提出的各种问题进行了梳理,每个问题都力争选择最佳解决方案,对不少问题进行了新的探索。今此书即将出版,应她作序之请,写出以上心得。相信本书的出版会对先秦兵书、先秦军事思想及先秦政治思想、哲学思想以及古代散文的研究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对如何在今天继承这

份宝贵的遗产,如何在国际对话、国际争端解决中,在部队、企业的管理中,在市场经济竞争中正确地运用兵书中的一些思想,本书也会带来新的启迪。

2006年6月25日

绪 论

先秦兵书思想恢弘博大,艺术精湛绚烂,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也是中华民族贡献于人类的智慧宝库。兵书究竟产生于何时?向有源于炎黄之说。汉班固《汉书·艺文志》“兵阴阳”条目下著录:“神农兵法一篇。黄帝十六篇,图三卷。”班氏注明诸篇为后人伪托之作。这表明,在汉代一般人的观念里,兵书发端于上古的炎黄时代。此说对后代影响极大,如明代的叶子奇在《草木子》中就认为“黄帝为兵法始祖”。同时代的沈际飞曾试图编辑《黄帝兵法》上中下三篇,称《黄帝天官兵法》,所辑录内容以流传的《黄帝兵法》言论为纲目,以《握机经》或太公、孙武、尉繚子等人的论兵言论为释义,又兼用历代兵学言论或战争事例来阐释自己的观点。近人陆达节认为:“中土兵学,肇自炎黄。”^①对兵法产生于炎黄时期亦持肯定态度。诚然,我国古代军事理论的积累,应该说从远古时代就开始了,当时,黄河中上游,有炎帝部落和黄帝部落组成的联盟;在黄河下游,有少昊部落和太昊部落组成的联盟;其他还有蚩尤部落、颛顼部落和帝喾部落等。这些部落、部落联盟之间经常发生战争。相传,炎帝部落与蚩尤部落交战,炎帝战败,转而求助于黄帝,炎帝部落与黄帝部落结成联盟,最终打败了蚩尤部落。后来,炎帝与黄帝最终组成联盟,形成了华夏民族,故炎、黄成为中华民族的始祖。虽然当时尚无文字,部落战争又属传说性质,但从近年考古发掘发现,特别是山东、河南龙山文化遗址考古发掘等,证明在炎黄时期就有了文字交往现象,还发掘出一些大型军事防御设施和以城池为中心的政治军事的遗迹,同时出土的还有大量的政语、兵法条例,故远古部落的战争也不完全是子虚乌有的编造,其中有关

^① 陆达节:《历代兵书目录·序二》,南京:军用图书社,民国22年(1933)版。

部族战争的作战经验和上古之人对于战争性质的初步认识,无疑为后世兵书的创作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上古时代,人类思想单纯,至迟从父系氏族社会开始,随着私有制的发展和阶级的分化,部落、氏族之间的掠夺战争愈益频繁,部落的联盟和更替都是通过战争的渠道实现的。可以说,华夏民族就是在战争中形成和发展的。这个时期的兵学,或许就是在甲骨上用简单的语言或符号记载下来一些战争的条文而已。

文字的出现是兵书最终形成的基础,从甲骨文以及其他商代文字(如殷代的青铜器铭文、陶文、石玉器铭文等)看来,中国汉字在三千五百年前的殷代后期已经基本成熟,由于当时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的思想还处于一种懵懵懂懂的状态,认为天是至高无上的,万事万物皆受天命支配,具有绝对的权威,它不但管理着自然现象,还主宰着人间的一切事务,如田猎、生产、建邑、征伐、灾害等等。从甲骨文的内容来看,卜祭祀居首位,卜征战也是很重要的一项。在人们的观念里,战争是受上天支配的,人们把预测战争胜负、吉凶及使用兵器等内容的卦辞写在甲骨或者各种器具上,这种记录军事与战争的甲骨文与铭文虽非正式兵书,但在某些方面已具有兵书的一些性质,并为后人留下宝贵的军事原始材料,可以看作是兵书的萌芽。

西周时,华夏文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当时已经有了专门书写材料的载体——竹简,书写材料的具备,为兵书产生创造了条件。我国有史可查的是《军志》、《军政》有关军事内容的片段,很可能就是西周晚期的兵书,距今已有 3000 多年的历史,可惜原文已佚,只在《左传》、《孙子兵法》、《尉缭子》等先秦文献中存留少量佚文。遗憾的是,西周虽是兵书的产生阶段,但并未留下一部完整的军事著作。

直至战争频繁、学术上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期,兵书才获得高度发展,自由的学术氛围,为军事家提供了活跃的政治舞台,兵书也在这种宽松的学术环境里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于是兵书得以繁荣,其质量也普遍较高。宋代朝廷主持编修的著名的《武经七书》中有五部作于先秦时期。《孙子兵法》的产生是兵书成熟的标志。《孙臆兵法》、《尉缭子》、《六韬》、《司马法》的相继出现则标志着兵书步入高度发展阶段。几千年来,先秦兵书作为宝贵的思想资源,对我国的政治、经

济、军事、哲学、文学、管理学、心理学甚至科技等诸多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先秦兵书对中外社会影响之广、影响之深前所未有,其独有的价值吸引了古今中外学者对此加以研究或借鉴。因先秦兵书大量佚失,本书只论述较为完整地保留下来的六部专著:《孙子》、《吴子》、《司马法》、《孙臆兵法》、《六韬》、《尉缭子》。

一、先秦兵书研究历程

回顾先秦兵书研究的历程,自西汉以来大致可分为六个阶段。

第一阶段:以整理校勘为主的两汉

对先秦兵书的整理盛于西汉。据史料记载,西汉政府进行过大规模的图书整理、校勘工作。依班固《汉书·艺文志·兵书略》“后序”所云,对兵书的整理大致有三次。第一次为汉初,命“张良、韩信序次兵法”。第二次为武帝时,“军政杨仆掎摭遗逸,纪奏兵录”。第三次为成帝时,杨仆“命任宏论次兵书为四种”,此次意义尤为深远。当时,刘向奉命主持大规模的图书整理工作,他亲自审定书录,刘歆撰写文字,由任宏论次兵书。任宏论次兵书的主要任务就是对兵书校理、分类,这是中国兵书的首次分类整理,在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这次整理主要是对图书搜集众本,校勘异同,分类排序,撰写书目,最后由刘向之子刘歆撰成《七略》,而“兵书略”正是“七略”之一,遗憾的是《七略》一书已佚。

时至东汉,光武帝及以后的几代皇帝都较重视整理兵书,《隋书·经籍志》云:“又于东观及仁寿阁集新书,校书郎班固、傅毅等典掌焉。并依《七略》而为书部,固又编之以为《汉书·艺文志》。”^①其中的《兵书略》共著录兵家五十三家,七百九十卷,图四十三卷。从《汉书》对先秦兵书的著录可知,先秦兵书大都亡佚,今仅存《孙子兵法》、《吴子》、《司马法》、《六韬》、《尉缭子》等少数几部。《孙臆兵法》在《艺文志》中虽有著录,但后来失传,直至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才重见天日。《汉书·艺文志》的《兵书略》是现存最早的一部兵书目录,成为考辨先秦兵书目录的重要依据。

这一时期,政府组织搜集、整理兵书,使诸多兵书有史可循,奠定了先秦兵书在中国兵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但这个时期仅限于整理阶

^① 《隋书·经籍志》卷一。

段,真正的学术研究尚未开始。

第二阶段:以注释为主的三国至隋唐

三国至南北朝,战乱频仍,社会动荡,人们思想极度混乱,旧有文献包括兵书遭到肆意的破坏。有唐一代,重文轻武,兵书的整理与研究未得到足够重视。诸多政治因素致使兵书的研究缓慢,但未停滞。此时,对先秦兵书的研究主要以注释为主,且以《孙子兵法》(以下简称《孙子》)为最,其他兵书则少有涉及。

西汉繁琐注经之风影响到当时文章的行文方式,如长篇铺陈的汉赋,洋洋洒洒、气象万千。说解文字现象盛行,即研读者在原文的基础上加以解说,解说文字往往多于原文字数。受此风影响,有关兵学注释亦如此。在这个特殊的时代,《孙子》必定遭到注经者的关注。曹操曾说:“世人未之深亮训说,况文烦富,行于世者失其旨要,故撰为略解焉。”^①曹氏认为前人所注不能理解《孙子》的旨意,于是亲自为之作注。曹操“博览群书,特好兵法”,又有御军三十年的实际作战经验,故能深得《孙子》思想之精髓,这是曹注本即《魏武帝注孙子》流传至今的重要原因。曹注虽失之过简,但仍不失为《孙子》注本的佳作。《魏武帝注孙子》成为这一时期的重要研究成果。从曹魏至宋代,注释《孙子》的注家达到了十一家,各家之注汇为《十一家注孙子》。所以说,曹操开注释兵书之先河。

从现有文献的记载来看,目录书对先秦兵书多有著录,对《孙子》的研究仅限于注释,其他兵书亦无研究性著作。根据兵书的著录情况,我们可以追踪先秦兵书的传播和演变轨迹。如与太公有关的兵书就著录了多种,有《太公六韬》、《太公阴谋》、《太公金匱》、《金匱》、《六韬》等不同的称谓。不同的书名,包含了丰富的流传与演变信息,这对兵书的文献学研究意义很大。

随着对兵书著录与注释的出现,兵书研究作为一门专门的学问从此初具雏形。但研究的内容仅局限于兵书的文字校注、句意阐释以及对一些军事理论的简单阐发,研究方向过于狭窄,其他研究领域还未涉足。可以说,这一时期先秦兵书研究尚处于萌芽阶段。

^① 《十一家注孙子序》,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第三阶段:兵书有了官修定本的两宋

经过五代十国的政权更迭与国家战乱,宋代统治者充分认识到,谁能掌握了“兵”,谁就能真正踏入政治领域,甚至谁就能主宰整个国家的命运,所以,统治者自然害怕兵权旁落,将自己推下历史舞台,于是就想方设法将兵权从大臣手中夺回,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就是著名的一例。从此,宋代进入了修文偃武的时代,自然,兵书也被列为禁书,故兵学发展处于停滞不前的阶段。同时,北宋又常受契丹、西夏的袭扰,边患频起,而防御不利,这才使统治者开始萌生重武意识。正如南宋晁公武所言:“天下久承平,人不习兵。元昊既叛,边将数败,朝廷颇访知兵者,士大夫人人言兵矣。”^①在内忧外患的威胁下,政府设立武学,军事学才开始受到重视。至神宗,因适应武举考试的需要,朝廷命令编定《七书》。所涉及兵书是《孙子》、《吴子》、《六韬》、《司马法》、《三略》、《尉繚子》、《李靖问对》,统称为《武经七书》(含先秦兵书五部)。

宋代以钦定的方式确定了《武经七书》为武举考试的教科书,标志着兵书的地位得到了官方的认可。这对兵书的普及及更深的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随之,研究性著作也蓬勃发展且成果突出,其特点如下:

一是《武经七书》得到官方的认可,确立了兵书的正统地位。郑友贤还将《孙子》与儒家经典《易经》等同起来:“庶几大《易》不测之神矣。”^②认为兵学与儒学地位相当。

二是兵书在校勘、刊行方面取得了较大成就。《武经》系武举科考之需而刊,所以影响亦最深。从宋代至清初,《武经》本在兵学中一直占有主导地位。宋刻本所知有二:一为南宋孝宗时刊本影刻的朱服《校正武经七书》本,收入孙星衍《平津馆丛书》(刻于1800年),原本下落不明;二为南宋孝宗时官版《武经七书》,此本原为清陆心源皕宋楼所藏,1906年日本岩崎弥之助将皕宋楼藏书全部买下,故原本藏于

①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十四,《丛书集成续编》本。

② 郑友贤:《十家注孙子遗说并序》,载于《十一家注孙子序》,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